

MINSUXUE DE LISHI LILUN YU FANGFA

民俗学的历史、 理论与方法

下 册

周 星 主 编



商務印書館

中国民间文学理论批评史话

民俗学的历史、 理论与方法

下册

· · ·

中国民间文学理论批评史话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下 册

周 星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周星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768-4

I. 民… II. 周… III. 民俗学 IV. 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12976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全二册)

周星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768-4/C·133

2006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8½

定价: 78.00 元

韩国民俗学的发展和研究课题*

〔韩〕崔仁鹤

一、民俗学的现代意义

民俗学就是研究民俗的科学,民俗指一个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关于文化,当我们提到“文化国家”、“文化生活”、“文化人”时,指的是知识、知性或受教育的水平;而当我们说“韩国文化”、“古代文化”时,主要是指生活状态。德语中的“Kultur”属于前者,英语中的“Culture”偏重于后者。当然,民俗学研究的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教育、知识水平,它是研究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的科学。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拉克洪(Claude Kluckhohn)的定义,所谓文化就是历史地、后天地形成的外在和内在生活状态,它由全体社会成员或某一部分成员所共有。简单地说,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集团性和共有性。韩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空间上彼此相关、时间上一脉相传的生活状态就是韩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民俗。流行一时而后消亡的、从属于某一特殊集团或阶层的,都不是这一概念所指。因此,韩国民俗学的最终目的是研究韩民族历史形成的、集体共有的内在和外在生活状态,并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系统。

二、民俗学的历程

1. 创建初期的历史背景

韩国民俗学研究从什么时期开始?对此,根据对民俗学概念理解的不

* 本文由赵杨译自崔仁鹤博士花甲纪念文集《韩国民俗学研究史》(韩文),知识产业社,1994年。

同也有所不同。例如有学者认为,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实学的出现标志着民俗学的建立。但也有人指出,实学与其说是一门具体的学派,不如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综合思想和哲学,因此,在关于实学的性质和概念最终确立之前,将实学视为民俗学的起源未免有些操之过急。目前公认的看法是,韩国民俗学研究出现在1920年代,经过10余年的发展,1932年韩国民俗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开始。特别是1927年发表的崔南善的“萨满教札记”和李能和的“朝鲜巫俗考”,在民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论著虽然仍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整理阶段,但可看出在当时重视巫俗的社会背景下,学者们也认同巫俗是民族文化的基础。

1932年,以宋锡夏、孙晋泰、郑寅燮为首成立了朝鲜民俗学会,并于第二年推出了创刊号学报。民俗学会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资料、普及民俗学知识、促进学者间以及与国外学会的交流。当时民俗学会的创设正是考虑到以往的研究仅局限于个人行为,缺少理论体系,而且对民俗资料的大量散失很感忧虑,希望尽快着手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

当时,一些西方的民俗学理论,特别是英国的民俗学理论陆续传入朝鲜;另一方面,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总督府,动员行政机构的力量收集了大量民俗资料。这些资料被一些日本学者利用,其研究不免存在着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明显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在日本国内还出现了所谓的“日朝同祖论”,日本当局强制推行取消朝鲜文字、一切出版物采用日文的政策。因此,民俗学会期刊1940年被迫停刊,共出版了3期。

2. 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1945年日本战败,韩国光复。但紧接着1950年再次陷入动乱,民俗学研究也处于停滞状态。战争结束后,历史学和国文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研究,1954年,国学大学开设民俗学课程;1957年,国语国文学会下设民俗学委员会。但这一时期,民俗学仍然作为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辅助学科而存在,以国文学研究者为主形成的民俗学研究,将重点集中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将巫歌视为叙事文学的一部分。

此外,1950年代后期民俗学研究没能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

承晚政府推行的“思想近代化运动”，即扫除迷信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无形中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起了消极作用。巫师们的活动一度消沉，不利于学者们的研究。从1958年开始，在政府推动下连续举办了全国民俗艺术大奖赛，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参加者的目的大多为了奖金，使这一集会变异为完全意义上的比赛。

1960年“4·19”集会，第二年“5·16”军事政变后，朴正熙上台。连续的政治动乱给学术研究特别是民俗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阻碍。直到1960年代后期，韩国民俗学界才就理论体系问题展开了几次大讨论。讨论的核心主要有两个：第一，民俗学是独立学科还是辅助学科？第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在此期间，韩国民俗学研究会于1969年成立并于第二年开始正式运转。它与文化人类学会一起得到政府支持，开始了全国民俗综合调查，可以说这是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机。

但是，民俗学发展中又一个不利因素出现了，这就是朴正熙政权推行的以农村现代化为目的的“新村运动”。这一运动以生活环境的改善、树立现代化意识以及增产增收为宗旨，因此，一切所谓落后的现象都得到了改造。茅草的屋顶代之以砖瓦，土墙被推倒代之以水泥墙；因为要拓宽道路，村中的神树被砍掉，竖在村口的守护神“长牲”也被烧毁；总之，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一切加剧了固守传统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老人与年轻一代的矛盾，也遭到民俗学者的反对。新村运动最初没有考虑到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在实行过程中遭到了反对，后来也作了一些矫正。从民俗学研究的观点来看，正是通过这次运动，学者们逐步认识到收集整理传统文化的迫切性，但是，已经流失掉的民俗要想复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新村运动带来的精神文化遗产的散失以及给民俗学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

1970年代，新村运动在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如前所述，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也对民俗学者有所触动，民俗学界自身的觉醒通过当时的几次学术会议有所体现。1971年，圆光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大学所属的民俗研究所，并召开了以“传统和民俗学的现代方向”为主题的大会；同年，又召开了主题为“民俗学的新课题”的讨论会。尽管当时民俗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整个学术界对此的反应仍很冷淡，在人们的印象中，民俗学只是几个学者的

振臂高呼而已,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俗学仍是一门孤独的学科。最终,学者们的呼吁被当局采纳,1979年安东大学正式设立了民俗学系。

1980年全斗焕政权执政后,主张继承民族传统,实行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其主要标志是设立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并就民族传统问题召开了几次学术研讨会。但这些工作没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响应,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用政府投资的金额来衡量,还不能说成绩辉煌,这也是政府领导及过多干涉下的研究机构的弊端。

全斗焕政权1981年推出了“国风81”政策,这一政策因过多的政治目的遭到大学生的抵抗。学生们对军事当局的示威日益激化,也加剧了社会动乱。然而,全斗焕的第五共和国却为民俗学掀开了新的一页,大学生的抵抗运动将校园变成了一个民俗活动的大舞台。由于这些外部因素,1980年代初民俗文化发生了变异,以民意被独裁政权践踏为主题的新的民俗游戏形式产生了。每次示威时表演的假面舞出场人物及内容都有变化,巫戏更是出现了新的节奏。这一时期的巫戏都以讽刺现政权为内容,出现了时局巫戏、时局歌曲、解放巫戏等新的名称,这也许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已,但对民俗学来说却是一个变异,也很值得研究。

3. 发展中的里程碑

以上我们回顾了1920年代以来韩国民俗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阻碍因素,这并不是为民俗学没能蓬勃发展起来所做的辩解,只是想说明民俗学是和民族一起产生、一起成长的,它是最容易受时代影响的一门学科。

在对70余年的民俗学史进行评价时,有的学者以10年为一分期,将民俗学的发展分为形成期、确立期、停滞期、发展期;也有学者概括为黎明期、中兴期、发展期、调整期;或者分为萌芽期、黎明期、形成期等。当然,这样划分的简单明了,未尝不可,但笔者仍认为对民俗学史的评价还需等到民俗史观的最终确立以及有关民俗学的认识和概念确定之后。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民俗学已不再是一门彷徨的学科,它已打下了学科的基础,不仅国内,国际上在民俗学各分科领域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水平。举例来说,1968年开始调查、1981年完成的《全国民俗综合调查报告》,1980

年代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完成的《韩国民间文学大系》，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推出的《韩国民族大观》等，都可以称为民俗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此外，1957年在国语国文学系中设立民俗学专业、1969年成立韩国民俗学研究会（1970年改称为民俗学会），以及1983年成立的致力于东北亚民俗学比较研究的比较民俗学会，这一系列活跃的学术活动说明民俗学研究已经走上了发展时期。

三、民俗学的地位和课题

1. 韩国人自己的学科

目前在拥有能讲授民俗学课程的教师的大学，基本上都设有民俗学教研室，1980年代以来，随着认识的加深，大学生中也出现了学习民俗学的热潮，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每年都有不少优秀论文涌现，但民俗学理论仍然没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在1971年安东大学民俗学系主持召开的学术大会上，就曾提出过今后发展的三个课题。第一即为理论的确立；第二是民俗学资料整理的迫切性；第三是提出了私人占有的资料应该公开化的问题。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三个问题仍没有一个得到了圆满解决。每年发表的大量论文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没有一个集中的主题，都是各自在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以自己的方法进行论文的大量生产。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民俗学的创始人柳田国男在世时，就以他为首重点研究了历史上日本民族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现在，对既往的学风存有疑义的一些中青年学者们，又力图将研究历史的民俗学引领上一条研究当代的道路。我们的民俗学却缺少这样一种同盟观念，虽有学会存在，却没有统一的学风。

如前所述，民俗学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科，但它绝不能仅仅研究过去，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无法与当代分隔开的。过去与现在相连，它又是面向未来的，民俗学还应揭示我们未来生活状况的指向。民俗学最基本的中心

课题,是考察我们祖先顺应时代变化的生活历程以及流淌在生活底层的精神脉动。历史上,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高丽和朝鲜王朝时期经历了无数变故,文化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但绝不能说韩民族的精神实质也发生了改变。变化的只是表层,是权力结构和外来文化。当然,这些变化也给民族的精神带来了伤害,但它仅仅使原有的形象有所逊色,并不能改变整个精神文化的走向。近期,“韩国人的意识结构”这一提法很流行,意识结构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民俗学正是研究这一命题的最佳手段。韩民族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把握穿越古今的韩民族深层的内涵本质正是今天民俗学所要解决的课题。

2. 基于民众的民俗艺术

在民俗学领域中民俗艺术占据的比重很大。与其他各分支领域相比,民俗艺术是最为活生生的,也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每年定期举办的全国民俗艺术大奖赛,每年都会产生一些不谐之音,但那主要是由于裁判标准、颁奖等主办方面的原因,大奖赛对抢救濒危的民俗艺术所作出的努力还是应该给予肯定。需要强调的是,民俗艺术是民众的艺术而不是个人的创作行为,它产生于民众、演艺于民众间,大奖赛的参加者也应该是民众。因此为了将此类活动办成国民欢庆的庆典,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类似全国民俗艺术大奖赛的活动最好经常举办,并且为了活跃各地民众的生活,还应该在各地区分别举办。

3. 学者间协作的迫切性

最后,还应指出为了更好地完成民俗学的研究目的,学者间的协作也十分必要。以前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曾有过,如精神心理学领域与巫俗研究学者的合作、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通过学会开展的共同研究等。但是,最迫切需要开展的还是历史学和民俗学、社会学和民俗学、宗教学和民俗学、人文地理学和民俗学以及语言学和民俗学等相邻学科的合作研究,只有通过这些研究,民俗学的理论框架才能确立。目前,韩国民俗学应用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利用外国先进的研究方法,对照我们的民俗资料寻找一些普遍

性和特殊性规律未尝不可,但用此来把握韩国人及韩国人的生活状态,也许会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整理资料以及开展各领域的共同研究和学者间的合作,尽快建立韩国民俗学自己的理论体系。

韩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

〔韩〕朴桂弘

韩国民俗学产生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赵芝薰是对韩国民俗学史做出简单论述的第一人，他认为1927年是韩国民俗学的肇始年。（赵芝薰，1964）因为这一年崔南善的“萨满教札记”和李能和的“朝鲜巫俗考”共同在《启明》杂志上发表；孙晋泰的“朝鲜的说话”、“温突文化传播考”也于同年发表；《东亚日报》在这一年的新年伊始，开始征集和发表“我故乡的风俗习惯”。

李杜铉、张筹根、李光奎共著的《韩国民俗学概说》（1974），认为民俗学的起点应该是对民俗的诸多问题产生科学的觉醒之时，因此，六堂崔南善（1890—1957）和尚玄李能和（1896—1945）的早期活动，应被视为民俗学的开始，这与前述赵芝薰的观点没有出入。但印权焕在认同1920年代是韩国民俗学形成期的同时，却指出朝鲜王朝后期的实学思想是民俗学的滥觞。（印权焕，1978：14）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1920年代崔、李两人早期的学术活动，应是民俗学的开始，具体的年代则是赵芝薰所说的1927年。

如此看来，韩国民俗学的历史不过半个多世纪，现在论述它未免为时尚早。因此，本文并不想论史，而只是依照年代考察一下民俗学的发展过程。

一、1920年代的民俗学

1920年代是韩国民俗学的肇始期，旗手是崔南善和李能和。这一时

* 赵杨译自朴桂弘著《韩国民俗学概论》（增补）（韩文）第36—57页，萤雪出版社，1987年。

期,崔南善先后发表了“檀君论”(1926,《东亚日报》)、“儿时的朝鲜”(1926,《朝鲜日报》)、“三国遗事解题”(1927,《启明》第19期)、“不咸文化论”(1928,《朝鲜及朝鲜民族》第18期)等;李能和则发表了“朝鲜佛教通史”(1918)、“朝鲜神教源流考”(1922)、“朝鲜巫俗考”(1927)、“朝鲜女俗考”(1927)等著述。尤其是崔南善的“萨满教札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篇民俗学论文,故有学者因此将该年视为韩国民俗学的肇始年。应该看到的是,当时的民俗学还没能脱离历史文献学的性质,也没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崔南善和李能和对韩国民俗学的创立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除崔、李两人外,关心民俗学并发表相关著述的学者还大有人在。如:

车相瓚《朝鲜民谣中的哀话》(1918)

严弼镇《朝鲜童谣集》(1924)

李觉钟《朝鲜的迷信和鸡龙山》(1924)

李光洙《民谣小考》(1924)、《民谣中的朝鲜民族性》(1927)

梁明《从文学看民谣和童谣及民谣、童谣的收集》(1925)

李殷相《寡居民谣小考》(1927)

金素云《朝鲜农民歌谣》(1927)、《朝鲜民谣的律调》(1928)

孙晋泰《朝鲜民谣和儿童性》(1926)、《朝鲜上古文化研究》(1926)、《岭南童谣的儿童性》(1926)、《朝鲜民间传说研究》(1927)、《朝鲜支那民族的原始信仰研究》(1928)

郑寅燮《朝鲜的乡土艺术》(1928)

金东焕《朝鲜民谣的特点和发展》(1929)

金志渊《朝鲜民谣》(1929)

李重华《朝鲜的弓术》(1929)

在此之前,日本为达到特殊的目的、采取特殊的方法已经开始关注我们的民俗。1910年“韩日合邦”之前,就发表有羽柴雄补的《朝鲜里程表》(1891)、长井衍的《朝鲜的神祠》(1896)、坪井九马三的《朝鲜的神话》(1905)等,其后此类论著更是大量涌现。1912年朝鲜总督府组织实施了“俚谣、俚谚及通俗读物等的调查”,这是对我国民俗的首次综合调查。(任东权,

1964)此后,三轮环的《传说中的朝鲜》(1919)、山岐日城的《朝鲜奇谈和传说》(1920)、难波专太郎的《朝鲜风土记》(1928)、高桥亨的《朝鲜的俚谚》(1928)以及由村山智顺承担的朝鲜总督府民俗调查资料集《民间信仰·第一部 朝鲜的鬼神》(1929)等相继出版。

就这样,目的和方法迥异的我国学者的民族主义民俗学和异民族的帝国主义民俗学一起启航了。

二、1930年代的民俗学

印权焕将1930年代称为韩国民俗学的确立期。(印权焕,1978:65)这一时期,民俗学具备了独立学科的面貌,并开始了首次田野调查,学科的内部划分更细,各领域都涌现出了专门的研究人员,民俗学会创立并出版了学术期刊。

1930年代的领军人物是孙晋泰和宋锡夏。孙晋泰在1920年代就发表了多篇民俗学论文,进入1930年代,又出版了资料集《朝鲜神歌遗篇》、《朝鲜民间故事集》,显示出对民俗学多个领域的关注。“特别是在对民俗起源和系统的把握、民俗历史的阐述上,他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的多种方法论,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着实令人惊叹。”(印权焕,1978:67)另外,他还将我们的民俗与周边各国民俗进行比较,开启了比较民俗学的源头。

宋锡夏的学术成果主要发表于1930年代以后,他“从1920年代初开始实地调查,称得上是韩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第一人。”(印权焕,1978:67)宋锡夏的论文有1932年的“朝鲜民俗剧”、“南方移秧歌”,1933年的“朝鲜的婚姻风俗”、“五广大小考”、“凤山假面舞”,1934年的“什么是民俗学”、“简介民俗艺术”、“风神考”、“东莱野游台词”,1935年的“新罗的民俗”、“朝鲜民俗概观”,1936年的“何谓广大”、“朝鲜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及对象”等,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朝鲜民俗考》,于1960年由日新社出版。宋锡夏治学的特点是,重视现场调查及资料的发掘和保存,与单纯的研究工作相比,他更致力于民俗现场的把握、调查、收集和保存、公演、采录及摄影等,在民俗学的社会认识和启蒙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印权焕,1978:68)

孙晋泰和宋锡夏的学术活动,使韩国民俗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在此期间起了很大作用。1930年代除孙、宋两人外,还有许多学者在各自领域进行了专门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如下:

○民谣领域

金素云《朝鲜口传民谣集》(1933)、《朝鲜民谣选》、《朝鲜童谣集》(1933)

林和、李在郁《朝鲜民谣选》(1939)

金志渊《朝鲜民谣研究》(1930)、《民谣阿里郎》(1930)

○民俗剧和民俗音乐领域

安廓《处容考》(1932)

郑寅燮《晋州五广大假面戏台词采录》(1933)

咸和镇《朝鲜的祭乐》(1937)、《歌舞故事》(1939)

○风俗和信仰领域

朴文玉《妊娠的习俗》(1930)

金文卿《出产的民俗》(1934)

金斗宪《朝鲜的早婚及其起源》(1935)

李相佰《朝鲜禁止妇女再嫁习俗的由来》(1937)、《朝鲜早婚的由来及近来的晚婚倾向》(1937)

张承斗《朝鲜古代社会拜天思想和婚姻制度的渊源》(1938)、《朝鲜原始诸种族的婚姻》(1939)、《李朝社会的婚姻仪式》

金允经《年中旧俗》(1935)、《八月名节的由来》(1935)、《端午的由来》(1936)

刘昌宣《朝鲜俚谚的伦理性》(1939)

○日本人所著资料集

这一时期在朝鲜总督府组织下,以村山智顺为首,先后出版了《朝鲜的

年中行事》(1931)、《朝鲜的风水》(1931)、《朝鲜的占卜和预言》(1933)、《部落祭》(1937)、《释奠、祈雨、安宅》等著作,秋叶隆和赤松智城合著的《朝鲜巫俗研究》也于1937年出版。

如上所述,1930年代众多的学者在民俗学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其中民谣领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还有民俗剧、民俗音乐、产俗、婚姻、岁时风俗、民间信仰、服饰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活跃,为韩国民俗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专业的学术团体也得以产生。1932年4月,由宋锡夏提议、孙晋泰和郑寅燮发起的“朝鲜民俗学会”成立。该学会以民俗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民俗学的大众普及为宗旨,1933年1月《朝鲜民俗》创刊,接着1934年5月出版了第2期,1940年10月出版第3期,遂成为终刊号。

三、1940年代的民俗学

1940年代前期,日帝的殖民政治达到顶点,后期人们又沉浸在解放的激动和喜悦中,因此各学科在1940年代都没有太大建树。与1930年代相比,民俗学研究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特别是1940年代前期几乎处于冬眠状态。这一时期仅发表了柳子厚的“扇子考”(1940)及“农村娱乐和击球”(1942)、赵润济的“说话文学考”(1940)、高裕燮的“药师信仰和新罗美术”(1941)、李云林的“六月的年中行事”(1941)、金映逐的“智异山圣母祠”(1943)、印贞植的“农村生活和迷信”等不多的几篇论文,出现了几位有实力的学者,勉强维持了民俗学的命脉。

1940年代前期崭露头角的新锐学者如任哲宰、崔常寿、赵东卓、洪以燮等,解放后为民俗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任哲宰1940年发表了“朝鲜的异类交婚故事”,确立了民间故事的研究方向;崔常寿表现出对地名和谚语的关注;赵东卓发表了“新罗的原义和黍离离叹及其他”(1943);洪以燮发表了“北方的传说”(1943)、“红罗女和宽永王”(1943),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民俗学最后的成果。

1940年代后期解放后,民俗学领域出现了几个新动向。第一,出版了不少资料集和研究专著;第二,大学开设民俗学课程及民俗学会成立;第三,新锐学者的出现。

以解放后第二年出版的崔南善《朝鲜常识问答》(1946)为首,后来先后出版了孙晋泰的《朝鲜民族说话研究》(1947),崔南善的《朝鲜常识》(1947),方钟铉的《朝鲜的谚语》(1947),周王山的《朝鲜民谣概论》(1947),崔常寿的《朝鲜地名传说集》(1947)和《朝鲜民间传说集》(1947),孙晋泰的《朝鲜民族文化研究》(1948),金思烨、方钟铉和崔常寿共著的《朝鲜民谣集成》(1948),方钟铉、金思烨合著的《谚语大辞典》(1948),崔常寿的《朝鲜谜语辞典》(1949)和《朝鲜民间传说集》(1949),高晶玉的《朝鲜民谣研究》(1949),张师勋和成庆麟合著的《朝鲜的民谣》(1949)等,在短短4年时间里大量的资料集面世。

1946年以崔常寿为中心创立了“传说学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民俗研究会。同年,洪以燮等创办了语言、历史和民俗类杂志《乡土》,共发行了9期,1948年停刊。1947年以后,淑明女子大学、国学大学(1948)和汉城大学(1949)先后开设民俗学课程,这是韩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金载元、成庆麟、金廷鹤、张师勋、任东权等,后来都成为1950年代民俗学研究的主力。金载元的《檀君神话新探》(1947)、金廷鹤的《对韩国神话的科学考察》(1948)开创了考古学研究方法;成庆麟的《朝鲜的雅乐》(1947)和张师勋的《民谣和乡土乐器》(1948)开辟了以民俗音乐为中心的民族研究道路;任东权1948年发表《韩国民谣试论》,使其成为民谣研究的领军人物,但他们的研究都因1950年的“6·25”动乱被迫中断。

总体上说,1940年代的韩国民俗学在学术上没有大的进展,仅维持了1930年代的水平,出版了一些资料集,使学术条件有所改善,但对民俗学理论思考并没有突破。(印权焕,1978:77—78)

四、1950年代的民俗学

195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民族纷争使所有学科都处于无法发展的混乱